

成都考古研究丛书

滇东黔西 青铜时代的居民

■ 周志清 著



科学出版社

成都考古研究丛书

滇东黔西青铜时代的居民

周志清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长期以来,滇东黔西地区并不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来予以讨论,如何将该地区青铜时代破裂的碎片缀合成历史片段,成为该地区当下考古学与族群研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本书通过梳理滇东黔西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来复原该地区青铜时代不同时段居民的聚落形态、生业模式、丧葬习俗及社会组织结构,确认该地区青铜时代的形式与特点,至少在距今3000年左右,当地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以鸡公山文化和瓦窑遗存为文化特征的居民是滇东黔西晚期青铜时代居民的主要源泉。滇东黔西晚期青铜时代独特的文化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与文献记载中的夜郎有着密切的联系,居民居住、生活于古夜郎周边的族群边界勾勒出夜郎系族群的边界。银子坛和可乐类型的主人是古夜郎主要居民,他们深受氏羌系统族群的影响,南方越人也是其重要成分之一。在西汉末期至东汉初后,当地居民已经被纳入汉文化圈和中原贡纳系统中,夜郎作为一个独立的族群就此消失。

本书适合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研究者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滇东黔西青铜时代的居民/周志清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03-039921-2

I. ①滇… II. ①周… III. ①古代社会-研究-云南省-青铜时代②古代社会-研究-贵州省-青铜时代 IV. ①K297.4②K29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9821号

责任编辑:王光明 肖丽娟/责任校对:刘小梅

责任印制:赵德静/封面设计:谭 硕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年3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4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8

字数:416 000

定价:1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序

西汉司马迁论“西南夷”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耕田，椎结，有邑聚。”耕田、椎结、有邑聚，是乃“七字真言”，揭示出夜郎、滇、邛都三大族群的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习俗是相同或相近的。其主体文明呈现出的一致性表明，他们属于具有共同特征的更大族群——后人或称濮，或称僚（獠），或归之为濮僚、滇濮系统，但后来被人为的“界线”分开，分属于黔、滇、川三地不同的行政区属。但其文明的主体——濮僚族系民族被昆明、壮侗、苗瑶三大族系的发展壮大所挤压，在不断演变的西南民族的分布版图中已然支离破碎。故而，长期以来，滇东黔西及相邻地区并不被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地理单元来予以讨论，因而其历史面貌常常如同其地貌一样被割裂开来，这是历史研究中容易发生的“以今观古”之习惯思维使然，以后来产生的状况来观察古代，其对远古的理解，必然会产生“误读”。“有文字”的汉代记录已被撕裂，更为遥远的时代面貌又将是如何？这个问题本身已足以引人入胜了。

本书所论，是司马迁论西南夷之前的“无文字”青铜器时代的历史，这当然得依靠也得益于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如何缀合所发掘出来的“文明碎片”，复原这一大片区域青铜时代历史的文化面貌，探讨其在不同时段中居民的聚落形态、生业模式、丧葬习俗及社会组织结构，成为该地区当下考古学与民族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滇东黔西地区青铜时代的进一步讨论是近几十年来该地区大量考古新发现的必然，这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一次悠远溯行，这就注定了路途中充满坎坷，灯火阑珊，却也风光无限。

考古研究表明，该地区至少在距今3000年左右就已经进入青铜时代，这些以黔西北威宁“鸡公山文化”和毕节“瓦窑遗存”为文化特征的居民，正是滇东黔西晚期青铜时代居民的先导。当地发现的晚期青铜时代的丰富资料，呈现出该地区文化类型多样性的特点。作者分析认为，“夜郎”与滇东黔西的青铜文化分布地域相接，时代相近（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用“夜郎系青铜文化”来指称，我以为这是可以成立的。夜郎本是西南夷数十君长之“最大”者，在其与西汉巴蜀两郡之间聚居有众多的“小邑”，后者被纳入西汉犍为郡的范围之中。作者将古夜郎研究与讨论置于“西南夷”这一宏大视野中加以审视，注意其历时性发展，进而分析该地青铜时代居民源流和古夜郎族属，正是其胜出之处。作者认为，战国至西汉中期这一时段，滇东北银子坛文化类型和黔西北可乐类型的居民是“夜郎系

青铜文化”中的主体，鸡公山文化居民及瓦窑遗存居民则是其文化渊源所在，他们可能是南方越人与北方氏羌关系交融的产物，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然而，黔西南边缘聚居的普安铜鼓山遗址类型的文明发展相对较弱，受南方越人的影响明显，西汉中期以后，夜郎系主体居民融入该地。汉人对滇东黔西地区长期的经略，使在西汉末期至东汉初后，当地居民已经被纳入汉文化圈和中原贡纳体系之中，作为一个独立族群的夜郎就此消失。此一论述，增补了秦汉及上溯千年文献缺失时代之西南民族古史的重要内容，值得治西南民族史者的关注。其间所论问题头绪较多，且考古资料本身也存在断层，学界意见或不尽相同，自然也还可以有继续加以研讨的必要。

将滇东黔西地区作为一个联系紧密的人文地理单元来看待，是通过分析与研究大量长时段的考古材料后所得出的结论，客观上证实了司马迁对“西南夷”的描述非虚言。新近发现的四川西南安宁河谷“高坡遗存”的研究表明，远在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滇东黔西地区就已经与安宁河流域古代居民发生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与族群互动，且稍早发现的滇东北昭通“野石山遗存”也正是这一结果的体现。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的考古发现呈现出并不完全相同的文化面貌，反映了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古代族群的文化多样性，正如作者所说：“秦汉时期文献记载中的‘滇’及位于其东北的同姓‘劳浸、靡莫’和‘夜郎’‘邛都’等西南夷同川西平原‘巴蜀’文化的势力在此犬牙交错，留下了许多具有鲜明区域和族群特质的文化遗存。”不同族群及其文化之间的交往与融合则是西南民族关系史上的永恒主题。

在“西南夷”的研究中，对夜郎的研究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学界有过对“夜郎文化”的激烈讨论，虽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却将西南民族古史研究推向了高潮从而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本书关注的“滇东黔西青铜时代”与“夜郎文化”虽然不是同一概念，但通过参照、分析和比较，使人们对古夜郎的中心、生业模式、社会组织结构、文化边界、族属等方面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也对该区域内青铜时代居民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及其不同于中原古代文化发展的动力与模式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志清博士潜心治学，多年来沉浸于对西南夷远古历史的复原构思之中，思虑宏远，十年一剑，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为学界奉献出这一值得瞩目的硕果，西南夷“前史”内容日渐增多，面貌也更加清楚，作为老师，自当欣喜！30年前旁听童恩正先生讲授“西南民族考古”课程，深知考古文化对西南古代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性。然而对于考古，我是外行，因而在与志清的往还中，我也常得“教学相长”之乐！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掘，中国西南民族远古时代的密码必将有更多的显现，祖国五千年历史的伟岸身躯也必将更为高大丰满。

是为序。

刘复生

2013年2月于四川大学农林村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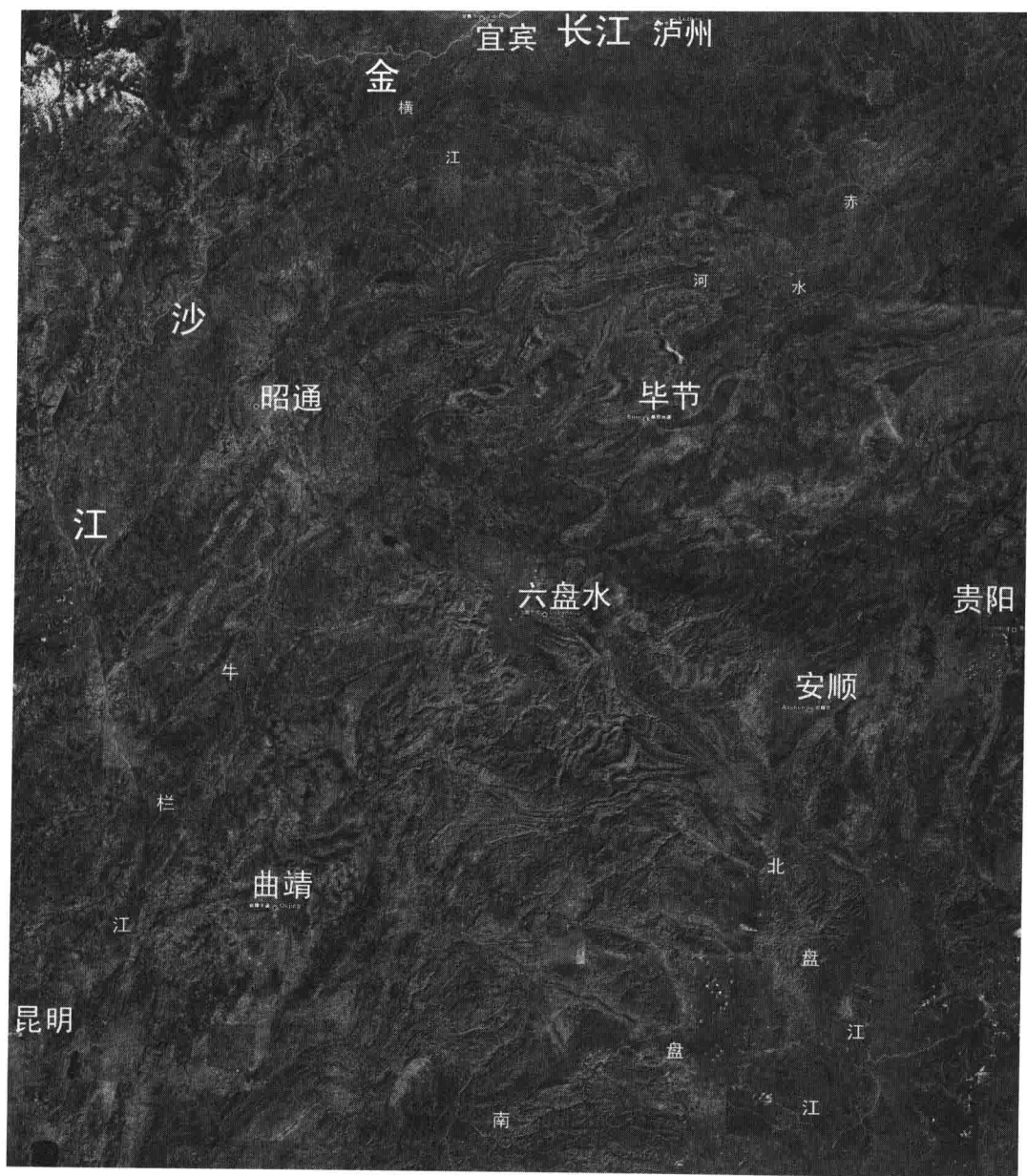
序	(i)
绪论	(1)
一 滇东黔西青铜时代文化的研究概况	(4)
二 研究现状与问题	(7)
三 目的与方法	(14)
第一章 中国西南地区的早期居民	(16)
一 澜沧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居民	(19)
二 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居民	(31)
三 岷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居民	(37)
四 洱海、滇池、滇东南及贵州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居民	(39)
五 川西平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居民	(43)
六 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居民	(46)
七 小结	(47)
第二章 滇东黔西早期青铜时代的居民	(53)
一 滇东北早期青铜遗存	(54)
二 黔西北早期青铜遗存	(61)
三 滇东与黔西地区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因素与时代	(62)
四 滇东与黔西早期青铜时代居民的生态环境与生业形态	(72)
五 问题与契机	(73)
第三章 公元前十三世纪至公元前九世纪昭鲁盆地与安宁河流域之间的文化互动 ——以高坡遗存为例	(76)
一 高坡遗存与安宁河中游地区先秦文化的关系	(76)
二 高坡遗址与野石山遗存的关系	(83)
三 高坡遗存时代及文化渊源	(89)
四 小结	(91)
第四章 滇东黔西地区晚期青铜时代的居民	(94)
一 滇东黔西晚期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94)

二	滇东黔西晚期青铜文化分期与因素分析·····	(98)
三	滇东黔西晚期青铜时代居民的生业形态·····	(114)
四	滇东黔西晚期青铜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互动·····	(120)
第五章	古夜郎与滇东黔西古代青铜文化·····	(125)
一	文献所载的“夜郎”及其研究·····	(125)
二	滇东黔西青铜文化的变迁·····	(130)
三	夜郎与滇东黔西青铜文化的关系·····	(134)
第六章	滇东黔西青铜时代居民的社会组织形态·····	(144)
一	滇东黔西青铜时代的聚落结构与社会整合·····	(145)
二	滇东黔西青铜时代居民的社会组织形态·····	(153)
第七章	秦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居民·····	(161)
一	西南地区秦汉时期的青铜文化·····	(163)
二	西南夷地区的主要族群·····	(171)
第八章	滇东黔西晚期青铜时代的居民与周边地区古代居民的关系·····	(181)
一	滇与夜郎系族群·····	(182)
二	曲靖盆地青铜文化与夜郎系青铜文化的关系·····	(188)
三	巴蜀对滇东黔西地区的经略·····	(196)
四	夜郎与夔·····	(204)
五	句町与夜郎的关系·····	(206)
六	南越与夜郎·····	(208)
七	夜郎与漏卧·····	(210)
八	夜郎与且兰·····	(211)
九	夜郎与楚·····	(212)
第九章	滇东黔西地区青铜时代的居民族属·····	(216)
一	滇东黔西青铜时代居民的族属研究·····	(218)
二	滇东黔西青铜时代的居民与近代民族的关系·····	(240)
第十章	汉略西南——以滇东黔西为中心·····	(246)
一	滇东黔西地区汉墓考古·····	(246)
二	秦汉帝国在滇东黔西地区的开拓与经营·····	(258)
二	小结·····	(266)
第十一章	结语·····	(268)
参考文献	·····	(275)
后记	·····	(280)

绪 论

云南东部与贵州西部位于云、贵、川三省交界之处，是云南和贵州北进四川的重要门户，与四川省的凉山州、宜宾市和重庆市隔金沙江相望。滇东黔西地区是西南地区一个特殊的地理单元，地处云贵高原的东麓，在历史上是云南通向四川和贵州两省的重要门户，是中原文化进入云南的重要通道，处于“南丝绸之路”的要冲，素有“锁钥南滇，咽喉西蜀”之称，是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贵州西部“三省鸡鸣”之地（图一）。本书所讨论的区域主要是指云南省的东北部、贵州省的西部、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该区域的东部属于乌蒙山系，西部则属于横断山区凉山山脉的五莲峰，在自然地理单元上呈立体分布，属于西南地区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之间，地貌上多高山和高原，属于典型的山地高原构造。该区域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喀斯特地貌发育良好。由于受地形和地势的强烈影响，该区域气候在垂直方向上的特点差异突出。“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正是其独特气候情景的形象写照。在高山和峡谷之间散落着许多西南地区独特的地貌特征“盆地”或“坝子”，这些盆地内适宜的自然生态环境和肥沃的土地，为早期人类的繁衍、生存、发展提供了理想的舞台，而遍布坝子的文化遗存正是古人类频繁活动的遗留，对它的发现与研究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滇东黔西地区地跨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境内河网密布，其中黔西北地区属于长江水系的较大河流有乌江干流及其支流；滇东北地区属于金沙江下游的则有横江、牛栏江等。黔西南地区的珠江水系则有南、北盘江干流及其支流等。这些河流的宽敞河谷地带所形成的天然通道，为人群的迁徙、商品贸易及文化交流等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致使该区域自古以来就是南来北往的族群与文化交融的重要孔道，同时也使该地区成为古代族群迁徙和文化互动最为频繁的区域之一，各流域内族群的地域性和多样性特征十分突出。这些具有鲜明流域性特征的丰富多样的族群文化，因考古发现与研究而走进世人的视野。秦汉时期文献记载中的“滇”及位于其东北的同姓“劳浸、靡莫”和“夜郎”“邛都”等西南夷同川西平原的“巴蜀”文化势力在此犬牙交错，留下许多具有鲜明区域和族群特质的文化遗存。

本书所探讨的滇东黔西地区的青铜时代有着明确的时代和地理边界（自然和文化），是被作为一个独立地理单元进行描述的；就时代而言，主要指该区域考古学文



图一 滇东黔西地形图

化年代的商代晚期至西汉末期，其中部分区域的考古材料可能达到东汉初期，约有1300年的历史。“中国的青铜时代，是指青铜器在考古记录中有显著的重要性的时期而言的。”^① 青铜器（特别是青铜兵器和容器及青铜铸造技术的出现与发明）的出现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基本标志，“如果中国历史上青铜器有显著性的这个阶段与用其他标准来划定的某个阶段相合，那么青铜器便有作为文化与社会界说的资格”^②。由于中国青铜时代在不同地区间出现与延续的时间各不相同，其社会发展阶段和表现的物化形式也存在着显著的地区滞后性与差异性，这种滞后性与差异性在西南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主要表现为中原地区早在距今4000年左右就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在距今3300年前后该地区就已经出现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和繁盛的青铜文明，延展了博大精深的中国青铜文化。东周以降，随着青铜器在其社会组织结构中地位的式微，特别是战国时期铁器已经广泛出现于当时中原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中原地区在春秋战国之交已悄然进入铁器时代，极大地改变了中原地区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历程。在西汉时期，随着铁器逐渐在巴蜀地区普及，西汉政府利用巴蜀文化圈在西南夷中的区域辐射中心的地位，逐渐开始影响西南夷的生产与社会关系。西汉晚期，汉式铁器在西南夷地区得到普及与推广，极大地改变了其社会发展进程，深刻地影响了西南夷青铜文化；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在汉王朝西南边缘地区的西南夷被纳入中原贡纳系统之中。铁器的出现引发了一系列的变革，如社会结构、经济及政治等方面都发生巨大变化，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具有深远的意义。“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极其坚固和锐利的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③ 铁器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文明，它不仅带来先进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对人类的文明发展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今天都有极为深远的意义。西南夷地区的铁器化进程与中原地区相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特征，如在西南夷地区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晚期这一时段的考古学材料中，仍然有着发达的青铜文化遗存（此时中原地区已经实现了铁器化进程），青铜器在其社会结构中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符号意义，是其社会结构与发展阶段的重要物化标志，这也表明该时段西南夷地区居民仍然处于青铜时代，铁器对其生产与生活及生产关系的影响甚微。中原地区与西南地区在青铜文化时段上的界说，差异性非常显著，西南夷地区青铜时代无疑处于滞后阶段。同时二者在青铜器主要形制的表现上也呈现出显著的差异：中原地区青铜器主要以其发达的容器和繁缛的礼器为

①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页。

②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页。

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2003年。

特征,“礼制”是其文化内核,也是国家威权社会的产物;但在西南地区则主要表现为兵器和工具及装饰品等,这是与其非国家形态或简单分层社会相适应的产物,具有浓烈的神权社会色彩。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或许与二者之间的地区文化差异性、社会发展环境与动力等不同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从事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研究时,应该针对具体问题做出具体的分析研究,并寻找符合该区域古代文化与历史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切忌不加分析或草率地以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标尺和界说来解读或解构西南地区如此多样的青铜文化,在从事边缘地区研究时需要特别注意不要对“中原中心主义”进行过度诠释或简单移植。

一 滇东黔西青铜时代文化的研究概况

滇东黔西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研究肇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随着黔西北和滇东北地区一批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的发掘和大量具有地域和民族特点的器物出土而得以开展。这个时期青铜文化的讨论主题主要围绕古夜郎的研究而展开,从一开始,该区域青铜时代的文化研究就与文献记载中的古夜郎捆绑在一起,并自动贴上了夜郎的标签。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夜郎研究催生了该区域的青铜文化研究,同时该区域青铜时代遗物与遗迹的发现也极大地促进了“夜郎学”的研究与发展。这个时期滇东黔西地区的青铜文化研究处于初期阶段,理论和方法尚不系统,研究的视野也相对狭窄,尚未形成一些针对特定课题的专题研究,所以这个时期该区域的青铜文化研究成果仅仅作夜郎史研究者的“配料”出现,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并且,研究与讨论的学者也主要是研究夜郎史的历史学者,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则处于缺位状态或非主流形态,声音微弱,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此外,该区域青铜时代的研究也主要是局限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这一短时段,未能够从长时段进行考量,不能对其文化源流进行充分而有益的探讨,并且研究目的和方法缺乏系统性。云南和贵州两省的学者受制于传统的行政区划,各自独立展开研究,各说各话,未形成综合全面的探究,严重影响了该项研究的深化,且在研究中缺乏宏大的研究视野,人为地将其以省际隔离开来研究,研究成果的局限性也是预想之中的事情。但正是这个时期的研究与发现催生了众多学者对古夜郎研究的热情,并开启了一扇充满想象空间的大门,一改过去以文献记载中的寥寥数语来循环考证的史学传统,开始意识到古夜郎中考古材料的特质和地位。当然,正是上述前辈的持续关注,为此后夜郎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初,随着夜郎文化研究的持续升温及一批田野考古新材料的披露,关于该区域青铜时代文化的研究一开始就进入一个喷发期,一大批相关研究文章涌现出来。一时间各种言论沸沸扬扬,俨然一片繁荣景象,但这个时期对滇东黔西青铜文化考古材料的解读被深受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影响的学者

所把持,研究方法 with 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更多的是关注阶级社会方面的讨论。该区域仍然一直未能被作为一个单独的区域来对待,主要还是作为夜郎研究与讨论的附属物出现,时代的特征与局限也特别突出,研究视野仍然过于狭窄,依旧未能突破省际界限。但是,这个时期的研究也形成一些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如《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初论》《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再论》《关于“夜郎”考古的几个问题》《贵州出土的青铜戈、剑的类型及其断代》《从赫章出土文物探索夜郎社会性质》^①等,代表人物有侯绍庄、翁家烈、宋世坤、周春元、刘恩元、熊宗仁、李衍恒、史继忠、席克定等人。宋世坤先生成为这一时期青铜文化研究的代表,他主要是充分利用了考古发掘出土材料进行考古学的分析与研究,构建了该区域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青铜文化的初步轮廓,为其他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时期夜郎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贵州研究夜郎的一部分历史学者在考证研究夜郎史料的同时,也注重加强考古资料的利用,如李衍恒《从考古学上探索“夜郎文化”》《夜郎青铜时代的文物》《贵州高原的古代文明》《从考古材料探寻夜郎》^②;席克定的《从考古资料探寻夜郎》《威宁、赫章汉墓为古夜郎墓考》^③等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这个时期该区域的青铜时代文化的研究时段虽然与初期大体一致,但明显地重视了考古材料的应用,讨论的范围与深度较之以前也已经出现较大的延伸,研究的宽度与厚度较之以前有较大提升。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夜郎研究的停滞不前及该区域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迟缓和考古资料积累的日趋薄弱,其相关研究进入一个间歇期。尽管如此,这个时期该区域的田野考古工作仍然取得一些进展,但对进一步研究夜郎的影响与贡献作用甚小,基本是对此前阶段研究成果的修补,这个时期该区域的青铜文化和夜郎研究总体处于一个缓慢发展的状态。此时该区域青铜时代文化和夜郎文化研究的特点是研究方法和理论相对滞后,缺乏宏大的视野与叙事环境,致使该区域青铜文化的整体研究水平缺乏创新、成果缺乏亮点,未能超越前人,只是之前研究基础上的补充

① 宋世坤:《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初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宋世坤:《关于“夜郎”考古的几个问题》,《贵州省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纪念专集》,《贵州省博物馆馆刊》1988年第5期;宋世坤:《贵州出土的青铜戈、剑的类型及其断代》,《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宋世坤:《从赫章出土文物探索夜郎社会性质》,《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 李衍恒:《从考古学上探索“夜郎文化”》,《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李衍恒:《夜郎青铜时代的文物》,《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李衍恒:《贵州高原的古代文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李衍恒:《从考古学上探索“夜郎文化”》,《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③ 席克定:《从考古材料探寻夜郎》,《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第3期;席克定:《威宁、赫章汉墓为古夜郎墓考》,《考古》1992年第4期。

与完善,或者是仅作一些相关专题的研究,如《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再论》^①《从考古资料论贵州汉代的交通与文化》《夜郎“套头葬”试探》^②《贵州夜郎考古研究》^③等。但可喜的是,在这一期间,关于该区域青铜文化与夜郎研究的一批方法与理论反思性和评论性的文章开始涌现,如《文献与考古结合是探讨夜郎问题的根本途径》^④《夜郎考古综论》^⑤《夜郎研究三题》^⑥《正确使用文献资料把夜郎研究逐步引向深入》^⑦《贵州研究夜郎五十年述评》^⑧《“夜郎学”的研究路径以及古夜郎与黔西北的关系》^⑨《2000年以来夜郎研究评述及进一步研究展望》^⑩等,目前这一反思过程仍在进行,并且其思考的内涵与外延的历史纬度也在不断地加深与扩展,从而使得夜郎研究得以焕发新生。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前几年,古夜郎研究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及贵州西部最近几年一批重要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极大地丰富了滇东黔西地区青铜文化研究的内涵,给该区域青铜时代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与动力,使古夜郎研究的视野半径得到进一步的拓宽;同时在考古资料得到进一步丰富的基础之上,夜郎研究对考古资料的利用与依赖更加突出,新方法与新理论的介入,使我们能够从考古材料中摄取更加丰富的考古信息,掀起了该区域青铜文化与夜郎研究的新一轮高潮。这些考古新发现将该区域青铜时代出现的讨论提前至商周时期,对于该区域过去认识不足的历史材料,结合新的考古材料加以分析与研究,发现它们已经基本具备初步复原滇东黔西地区早期青铜时代历史场景和文化面貌的条件,这给我们提供了对这个时期居民的生业和社会组织形态及族属源流等方面的思考进行描述与阐释的舞台。这些新发现对于古夜郎的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弥补了过去较大时段因考古材料断裂造成的一些缺憾,丰富了战国至两汉时期的考古材料;不断释读一些新的文化因素和信息,使得该时段遗存文化图景的厚度得到进一步延展,使其族群性与地域性特征得到

① 宋世坤:《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再论》,《贵州文物》1997年第1期。

② 张合荣:《从考古资料论贵州汉代的交通与文化》,《贵州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张合荣:《夜郎“套头葬”试探》,《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

③ 梁太鹤、曾令一:《贵州夜郎考古研究》,《考古学民族学的探索与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梁太鹤:《夜郎考古思辨与述评》,《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④ 史继忠:《文献与考古结合是探讨夜郎问题的根本途径》,《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⑤ 宋世坤:《夜郎考古综论》,《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⑥ 翁家烈:《夜郎研究三题》,《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⑦ 侯绍庄:《正确使用文献资料把夜郎研究逐步引向深入》,《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⑧ 熊宗仁:《贵州研究夜郎五十年述评》,《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⑨ 林建曾:《“夜郎学”的研究路径以及古夜郎与黔西北的关系》,《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⑩ 夏增民:《2000年以来夜郎研究评述及进一步研究展望》,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信息网,2003年7月。

不断强化,为古夜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该区域晚期青铜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在提供古夜郎的丰富的实物证据的同时,也强化了古夜郎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滇东黔西青铜时代文化的研究对于中国西南乃至整个南中国地区的青铜文化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其独具区域特色的青铜文化是中国青铜文化大家园中一朵绚丽的奇葩,对于中国西南地区及东南亚地区古代青铜文明范式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发展模式或范式有着与中原地区不同的发展轨迹。其独特的发展路径与文化图景,对于我们了解中心与边缘地区的关系有着深远意义,在展现中国多元青铜文化图景的同时,避免了单向度线性历史研究的泛化,加强了该地区古代文化发展历时性的复线研究。同时,该地区青铜时代居民的复原研究有助于加强研究文献记载中的古夜郎文化,为研究与探讨古夜郎文化发展演变及其族属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历史想象的空间,对于研究西南地区的族群史和开发史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也许该课题的研究更多的是提供了一种研究途径或范式,展现边缘地区复线和多元的历史与文化图景,而不是寻求中心模式化的规律。

二 研究现状与问题

滇东黔西地区青铜时代的研究是随着夜郎研究的兴起而出现的,长期以来它并未被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区域对待,而是作为夜郎研究的派生物出现,与古夜郎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自明清以来兴起的古夜郎研究^①,一直把贵州西部作为古夜郎研究的重点,目前的研究认为贵州西部地区与文献记载中古夜郎的活动空间的地望接近,该区域的青铜文化(战国晚期至西汉)与古夜郎有着紧密的关系,对此,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多无疑义。但该区域目前发现的青铜时代的文化是否等同于古夜郎文化?该区域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何时出现?其文化面貌如何?它来源于何方?它与该区域晚期青铜时代的居民关系如何?……目前研究中尚未有人对此进行过相关的系统的讨论与研究,或未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这是目前该区域早期青铜时代研究中最大的缺憾之处。造成此种情形的原因是:一方面囿于该区域早期考古材料的有限积累和认识上的缺憾;另一方面则反映出部分研究者研究视野的狭窄和理论知识的单薄。该区域的青铜文化是一个长时段的文化,文化发展呈现动态性而非静止状态,无论从时间上、空间上还是从文化内涵等方面而言,它都是一个不断发展与变化的系统。在不同的时段和空间内,其文化内涵与外延必然随之发生着动态的变化,因此我们在分析与研究时,不能以静止的眼光观察或剖析它,而是必须以动态和发展的眼光去观察和分

^① 夏增民:《2000年以来夜郎研究评述及进一步研究展望》,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信息网,2003年7月。

析它,才能仔细描述和有效释读滇东黔西地区青铜时代复杂而多样的考古材料,这也是目前理解该区域青铜时代文化的关键。在目前文献资料严重缺位的情形之下,对这些青铜文化作细致的考古学分析与研究是解读与阐释古夜郎文化的基本切入点和方法。

滇东黔西地区的青铜文化最早始于何时?它们与夜郎文化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囿于考古资料的积累和认识上的差异,目前还没有人或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些问题,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了解该区域青铜时代居民的发展、变迁及古夜郎的身份与界定等相关信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过去对该区域青铜文化的认识主要局限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这一时段的考古材料,其与古夜郎文化的研究如影随形,基本上不脱离古夜郎研究的范畴,或者是为古夜郎研究服务,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从目前的考古材料进行分析与研究,笔者认为,早在商代晚期,在滇东北与黔西北地区就已经出现青铜文明,这些早期青铜文化包括过去云南和贵州学者所认为的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鸡公山文化^①、阐心场与马厂类型^②等。鸡公山文化代表了以昭鲁盆地为中心的早期青铜文化,其为当地新石器晚期文化和川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影响的产物,文化因素具有明显的复合性特征,目前其源头仍然不够清晰;瓦窑遗存则代表黔西北地区乌江流域的早期青铜文化,该青铜文化是在当地晚期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深受峡江地区新石器晚期文化的影响。目前滇东黔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发现较少,辨识度不高,对其文化面貌的认识长期以来一直是一头雾水,其文化内涵与时代特征尚不明朗,研究中的缺环也比较多,还需要更多的考古新资料的持续补充与完善,这也是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课题。

相对而言,目前滇东黔西地区晚期青铜时代文化的考古材料有着较多的积累,分布范围也较为广泛,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族群性及时代特征,但过去为了迎合古夜郎的研究而忽视了各地区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差异,众说纷纭,导致在古夜郎范围、中心及文化认同边界等方面的研究中存在着诸多的歧义。宋世坤先生认为将该区域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拥有自己的典型器物的文化命名为贵州古夜郎地区的青铜文化^③。但梁太鹤先生在此基础上认识到该区域这一时期青铜文化中存在着地区的联系性与差异性,认为目前考古学上对“夜郎文化”进行命名的条件尚不具备^④。但夜郎史研究者认为目前该区域出土的青铜器为夜郎遗物,如李衍恒认为

①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贵州威宁县鸡公山遗址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8期;张合荣、罗二虎:《试论鸡公山文化》,《考古》2006年第8期。

② 周志清:《浅析金沙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类型》,《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4期;王大道:《再论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类型》,《云南考古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

③ 宋世坤:《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初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宋世坤:《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再论》,《贵州文物》1997年第1期。

④ 梁太鹤:《夜郎考古思辨与述评》,《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该区域目前发现的青铜时代的文物可以被看做“夜郎”文物，并以“夜郎文化”命名之^①；席克定先生认为首先提出了“确定夜郎遗址与墓葬的标准”，即“从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这一时段内，在“南中”地区内以当地土著农耕民族文化为主要特征的遗址和墓葬，才有可能是夜郎时期的遗址和墓葬，才有可能是夜郎的遗物，其所构成的考古学文化，才有可能是“夜郎文化”^②。“夜郎文化”的命名不科学，首先，它不符合考古学命名文化的标准，尚未发现可清晰界定为夜郎的遗物；其次，它缺乏考古学精致的分析与研究，研究上时间和空间的视野过于狭窄，忽略不同时空文化遗存的历时性变化；同时，从历史学视野角度观察，它缺乏长时段的理念，忽视古代文化与族群发展中“历时性”的因素。笔者认为“夜郎系青铜文化”或许是目前该区域战国早期至西汉末期当地主体居民所创造的青铜文化较为理想的指称。由于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类型研究滞后于夜郎学研究，其青铜文化的研究现状也以“夜郎”研究的现状为参考系。夜郎中心和分布区域说主要有“黔西南”说^③、“滇东北和黔西北”说^④、

① 李衍垣：《从考古学上探索“夜郎文化”》，《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李衍垣：《夜郎青铜时代的文物》，《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李衍垣：《夜郎青铜时代的文物》，《夜郎史探》，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② 席克定：《从考古材料探寻夜郎》，《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第3期。

③ “黔西南”说主要是指夜郎的主要分布区域在南北盘江流域，其中心在二者之间。见宋世坤：《关于“夜郎”考古的几个问题》，《贵州省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纪念专集》，《贵州省博物馆馆刊》1988年第5期；李衍垣：《贵州高原的古代文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夜郎境内可能不止有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是多中心的存在，寻找‘夜郎文化’的遗迹，不应局限于狭小范围去着眼搜寻所谓夜郎国的‘国都’……六冲河和三岔河流域及三岔河与北盘江上游之间的地带，实际上是狭义夜郎境内早期统治的中心区域。”见余宏模：《古夜郎境内的彝族先民》，《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古夜郎国的政治中心应在黔南的惠水、长顺、罗甸、册亨地区。”见周维衍：《古夜郎三题》，《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普安、盘县、兴仁一带，似乎应该就是夜郎的中心所在。”见侯绍庄：《夜郎方位考略》，《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④ “黔西北和滇东北”说主要有以下几说。“夜郎在今贵州省西北部、云南省东北部一带地方”。见宋世坤：《汉代夜郎方位的再探索》，《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汉代夜郎的方位，应在黔西北地区。所谓‘夜郎文化’的遗迹，可能存在于今毕节地区的辖境内。”见席克定：《汉代夜郎方位探索》，《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夜郎在今贵州省西北部、云南省东北部一带的地方。”见席克定：《汉代夜郎方位的再探索》，《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夜郎侯邑在今天的云南省东北角南、北盘江发源的地方，主要指宣威、沾益、曲靖、富源一带。”见罗荣泉：《汉夜郎侯邑地理位置辨》，《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等等。

“安顺”说^①、曲靖说^②等，这些区域都包括在滇东黔西地区，但目前尚缺乏对该地区特定考古学文化类型之间的具体分析比较，表述较为笼统，模糊不清，缺乏实物证据，需要进一步的深究。

关于夜郎的社会性质，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最为盛行的是认为它已经进入“奴隶制社会”^③，另一种是认为它还处于“军事民主制社会”^④。这些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理论单一，忽视了其可能存在着的其他研究途径或未能以动态的眼光观察不同时段内青铜文化的变化和族群成分来源的复杂变化。

滇东黔西地区青铜时代的居民的族属研究长久以来就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课

① “安顺”说主要有郑珍的《牂柯十六县问答》、莫与俦《都匀府南齐以上地理考》，他们都认为夜郎国都在安顺。“夜郎国都在今安顺境内。”周春元：《夜郎略论》，《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夜郎国都所在地似以安顺、镇宁、六枝一带较为适中。”侯哲安：《夜郎初步研究》，《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等等。

② 孙华：《滇东黔西青铜文化初论——以云南昭通及贵州毕节地区的考古材料为中心》，《四川文物》2007年第5期；张合荣：《夜郎地理位置解析》，《南方民族考古（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

③ 宋世坤：《试论西汉时期夜郎的社会变革》，《贵阳师范学院学报》1976年第3期；宋世坤：《从赫章可乐出土的文物探索夜郎社会的性质》，《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余宏模：《汉初夜郎社会性质浅析》，《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何积全、黄才贵：《西汉夜郎奴隶制初探》，《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张英志、顾大全：《试论西汉夜郎奴隶社会》，《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侯哲安、王正贤：《从古夜郎的疆域及阶级机构看其社会性质》，《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吴廷栋：《西汉夜郎的社会矛盾》，《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这些文章中都认为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夜郎为奴隶制社会。

④ 蒋永康：《古夜郎社会性质质疑》，《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朱俊明：《古夜郎是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共同体》，《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